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综述

孙 芳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华北电力大学 政教部,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辛亥革命的时评、论文和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本文对其从辛亥革命人物史研究、过程史研究、意义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学科史研究、文献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海外研究以及问题与展望等 9 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与梳理,对于我们还原辛亥革命,正确认识辛亥革命,不无裨益!

关键词: 辛亥革命; 孙中山; 综述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3)02 - 0095 - 16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UN Fang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84;
Polit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3, China)

Abstract: 2011 i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re are lots of reviews, papers and works commemorat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is paper sums up and sorts out nine aspect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researches on live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historical processe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local history, disciplinary history, documentary history, history of CPC, and history of overseas, as well as issues and prospect, which is helpful for representing and understanding correctly the Revolution of 1911.

Key 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un Yat - sen; review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辛亥革命的时评、论文和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有肯定亦有否定,有褒奖亦有贬斥,有人云亦云的附和亦有极智穷思的审视,将这些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对于我们还原辛亥,正确认识辛亥,不无裨益。

一、辛亥革命的人物史研究

(一)孙中山的全景式研究

1. 孙中山的历史定位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1] 据笔者目力所及,绝大多数学者对孙中山也持褒奖态度,如刘学照认为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是 20 世纪中国第一位具有"百年发展思想"的革命实行家和思想家。[2](P150) 李恭忠指出孙中山的一生始终走在时

收稿日期: 2012 - 12 - 2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批准号: 13MS122)
作者简介: 孙 芳(1976 -),女,河北保定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教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史。

代的前列,在诸多重要节点上,总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显得技"先"一筹。这也是孙中山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之本来基础。[3] 朱相远认为孙中山所以成为 20 世纪世界级伟人,就因他是贯通东西方文化第一人。中国近代革命家,或不懂外文,或精通文史不懂数理化,惟孙中山掌握中西语言又兼通文理。这便使他能超越其他革命领导人。对于有着强烈"圣人情结"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唯有孙中山才是中国人心中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神支柱与文化"圣人"[4](P111-112)

但除此之外也有不同看法,最具代表性的恐属张鸣的观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作用不大。首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跑到美国去了,"对革命极度失望",认为"革命是没戏了"。其次,武昌起义不是他指挥的,也不是他部署的。第三,所需的经费孙中山也没给一分钱,是革命党自己筹集的。第四,筹备成立临时政府时,没有人想到他,只在黎元洪和黄兴之间选择,在两人争执不下时孙中山回来了,他就成为一匹黑马。孙中山在革命中的象征意义更强一些。[5](P32)

李维民认为长期以来,辛亥革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自然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行列,算作资产阶级分子了。但是,这种评价是否客观公正、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却值得推敲。[6]

章开沅先生认为孙中山并非十全十美,世界上任何伟大历史人物都不是十全十美,包括已被人们奉为"后世师表"的孔老夫子。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有重要贡献,也有不少错误,甚至严重过失。比较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海外"输入式"的少数志士潜入沿海城镇举义的僵化模式。[7]

2. 孙中山的治国理念

第一,民族主义的思想

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8](P11-12) 章开沅认为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思考,发人深省。[9](P35)

第二,民生主义的思想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思想最具有特色的部分,被中山先生视为可以有效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途径。李琨认为民生主义既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明,中西文化融合、衔接,使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到土壤,又使儒家的民本思想外化为民主制度。[10] 作为其重要内容的"节制资本",一方面阐述了通过节制私人垄断大资本而防止国家为少数人所把持的理念设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通过鼓励私人中小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从而振兴中华的民族诉求。[11] 民生主义政策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永远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孙中山在建立中华民国后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在社会发展目标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8](P12)

第三,民权主义思想

主要是以五权宪法为纲领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是: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9](P35) 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具有启发意义。

第四,"行易知难"说建设国民心理

刘学照认为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是中国第一种自觉冲破传统道德践履范畴,具有广泛社会实践视野的知行话语。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像他说出这么多充满"实践之科学"精神并洋溢着辩证思想亮点的知行话语的人没有几位,而他更是提出"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这种务实进取思维模式的第一人。其所具有的"学问革命"和解放思想的意义不可低估。[2](P151)

第五，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

孙中山一直把革命和建设问题放在事业的核心位置。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相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孙中山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进行的，只是残酷的现实无法实施。[8](P9)

3.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

王晓秋认为，从 1895 年策划广州起义失败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其中，他在日本居住 5 年，在南洋居住 4 年左右。日本和南洋成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最重要的两个海外基地。[12]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作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为国内的一次一次武装起义出钱出力就是孙中山广泛动员的结果。革命之初，海外洪门对革命的态度并不积极，为了动员海外洪门支持革命，孙中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动员措施，终使海外洪门从不理解革命转变为积极参与革命。[13]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促发了海外民族主义的形成。辛亥革命时期，并未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说辞，但孙中山在统一海外华侨爱国革命之心的过程中，所做的种种努力处处透着现代统战工作的身影：政治统战——华侨英勇献身于革命，经济统战——华侨慷慨捐款为革命，思想统战——为革命吸收大量爱国华侨，文化统战——华侨纷纷建校宣传革命，很值得学习和借鉴。[14]

（二）多元化的个案研究

第一，对黄兴全新视角的研究

众所周知黄兴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他与孙中山并称“孙黄”，被誉为“开国二杰”。萧致治从黄兴十次进出日本挖掘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形成了民主革命思想，形成军国民教育路线，建立中国同盟会，实现全国革命力量大联合，创办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革命宣传得以顺利展开，筹款购械，招聘军事人员，策划各地武装反清斗争。[15]

第二，对鲁迅与辛亥评价的研究

鲁迅亲历目睹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参与绍兴光复活动，积极进行革命的思想宣传工作。[16] 但后来更多地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局限与缺陷，而于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形式上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的伟大历史功绩认识不足。[17] 刘明钢则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鲁迅对辛亥革命评价不高的原因。

第三，对蒋翊武早期革命策略的研究

袁南生将蒋翊武与孙中山早期革命策略进行了对比研究。在革命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要依赖会党，蒋翊武则主要依赖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在起义地点方面，孙中山意指华南，蒋翊武则盯在武汉；在起义时间上亦有果断判断。蒋翊武在实践中，为推翻专制的清王朝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18]

第四，宋教仁思想研究

刘云波提出宋教仁对辛亥革命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全面性、系统性；二是民主政治思想的激进性和深刻性。其民主政治思想还具有非常突出的两大个人特色：一是对内阁制民主的极端崇拜，二是强烈的法律意识。[19] 刘芳等学者对宋教仁的思想进行了综述性的梳理，内容大致分为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宋教仁政治思想的评价三个方面。[20]

第五，孙眉与辛亥革命研究

黄健敏整理了孙眉家族所藏书信并辅以相关史料，简略梳理了 1906 – 1911 年间孙眉的革命活动、经济状况以及家族亲属关系，为我们还原了孙眉支持参与辛亥革命从金钱到行动，从物质到亲情的历史细节。[21]

第六，田桐与辛亥革命研究

张金超收集了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相关档案，结合已刊史料和先关论著，述

论辛亥革命前后田桐的革命活动,阐发了田桐的理论建树,以及在维护孙中山领袖权威、消弭部分党员的动摇与偏见中所起到的总要作用,深化了辛亥革命史人物论析的研究。[22]

第七,秦毓鎏与辛亥革命研究

周新国等学者考察了秦毓鎏一生从传统绅士到反清革命志士,从致力于共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逐渐消沉,以秦毓鎏一生的变化过程为我们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变化的轨迹,透视出民主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23]

(三)人物团体研究

第一,海外华侨研究

庞卫东在对近30年来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认为南洋华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相关的南洋侨领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社会思潮研究;孙中山在南洋的筹款活动;辛亥革命时期的南洋华文报刊等几个方面。[24] 徐炳三则分析了南洋华侨在民族认同方面所经历的复杂过程,以及这种认同所起到的积极意义:砥砺精神,凝聚力量,辛亥遗产成为华侨参与抗战事业精神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25] 刘加洪还专门研究了客家侨胞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和作用。

第二,知识分子研究

辛亥年间新式知识分子群人员构成以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知识结构从"四书五经"到会通中西,政治理想由维新改良到民主革命。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实践,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到革命团体的组建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从与改良派的思想斗争,到多次武装起义的发动,新式知识分子都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26] 彭平一等学者还从长沙独特的历史地位出发研究了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认为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既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特征,也从其绅士阶层渊源中继承了带有浓厚湖湘文化色彩的精神特征:一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担当精神,二为"劲直勇悍,好胜尚气"的"士气"。这些特征对长沙地区,甚至于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形成了重大的影响。[27](P1-5)

第三,留学人士研究

沈荣国认为历史不应该忘记长期投身革命的仁人志士,尤其是在国内人士近代化意识不足的情况下给革命以强劲支持的近代留学人。并以珠海留学人作为研究的坐标探讨了留学人士持久、系统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的中坚力量。[28] 陈昌福则重点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认为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崛起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相契合,促成了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的蜕变,在同盟会的建立以及武昌首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9]

第四,士绅阶层研究

傅国涌指出从1909年到1911年春天,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人地位都很高,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士绅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30](P74)在晚清社会中,士绅阶层出现向新社会阶层的转化,一部分由绅而商,成为近代企业家或实业家;一部分由绅而学,成为近代教育家教师、新闻和出版的从业者;一部分由绅而军,即以绅士身份投入新式军队,有的甚至加入到会党中。[27](P1-2)他们争利权,兴西学,办教育,谋自治。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31]

第五,立宪派研究

早在1960年,作为辛亥革命参加者的吴玉章就曾对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过中肯的评价各省成立的谘议局具有双重作用:一是起了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谘议局的议员们虽然大多数只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他们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二是"起了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加强它的妥协性的作用"。可见,当时的革命者也并未全面否定立宪派的作用。[32](P19)

第六,基督教群体研究

宋惠昌认为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33] 吕绍勋更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心灵、宗教和思想的革命。它不仅带进了民主共和之观念，更是神之恩助的彰显。[34] 王静以布朗的《中国革命》为切入口进行了辛亥革命的传教士研究，认为传教士是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最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更侧重的是中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其看法和分析或以宗教为饭依或受到自身认识的局限，自然有不足之处。但却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给辛亥革命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史料。[35]

二、辛亥革命的过程史研究

(一) 关于革命源起

谢放提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应该以多维的视野来研究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进程。[36]

陈德辉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轨迹：清廷的极端腐败，改良主义的曲终人散，列强瓜分中国的加速进行，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任何温和的创新和变革尝试都被会被扼杀于萌芽状态。[37]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必将诞生。

杨银权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科举入仕的中断使得旧式士人转而从商、从军，这不仅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还为清王朝的覆亡培育了直接的掘墓人。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儒家的忠君思想开始动摇，大批士人的留学和新式学堂教育为他们接受西方革命学说提供了机会，而这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思想基础。[38]

沈渭滨强调正是晚清近 50 年的“自改革”，特别是最后十年“渐进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酝酿与准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没有晚清的“自改革”，就没有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就没有依附于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没有新的社会思潮沤浪相逐的层层递进；就没有反戈一击的革命化新军；也没有被边缘化而进人谐议局的士绅；甚至也没有最初拥护预备立宪、最后对之绝望的立宪派。[39]

台湾学者黄克武认为辛亥革命有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进来。革命成功乃汇集了各种势力之后所共同形成，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则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秩序，起而响应。[40]

姜义华则认为辛亥革命的真正动力，其实是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精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天下国家责任伦理。而家国共同体和贯穿其中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正是中华文明长久存在、持续不衰的奥秘之所在。[41]

张鸣认为辛亥革命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是一场意外。从后来的历史看，立宪的变革，就是非革命的变革对中国显然更好。清政府如果能够正常立宪，宪政、民主等制度迟早会落地生根，社会变革也会比较平稳。[5](P31－32)

(二) 关于孙让位，袁上台

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这也是辛亥不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李维民指出孙中山虽然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但各省的军队都掌握在各省的当权派手中，大部分并不情愿听孙中山的招呼；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基本上也是一个空头司令。在这种形势下，与袁世凯议和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也是不能不作出的让步。[6] 李吉奎认为孙让位，袁上台是民初最好的选择。南北统一，国家避免了一场战祸。且当时不管是在原立宪派、各国公使，还是在革命党方面，呼声一致：中国新领导人“非袁莫属”。大总统之职为国会选举而得，袁氏当国，不能认为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42] 马勇也认为这种让步无损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丝毫光辉，但却为中国迎来了重大机遇。100 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没有做到，几年后的俄国革命也没有做到，只有辛亥革命以极小牺牲换来了一个帝制时代的终结。[43]

(三)关于辛亥革命的结果

关于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百年辛亥研究在前人的足迹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许增紘指出辛亥革命能迅速取得倾覆清廷、革除专制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众觉悟到非倒清不可而对反清革命给予同情和支持;其失败,与民众对革命真义的觉悟甚低亦关系重大。对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等鲜有正确认识,这就使革命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44]

张皓认为革命阵营内的名位之争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首先是文学社、共进会之争,导致了长江中游辛亥革命的失败;其次是、同盟会与光复会之争,导致了东南地区辛亥革命的失败;最后是、同盟会、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之争,决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短命结局。[45]

傅国涌认为中国从辛亥前到辛亥后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而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并指出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30](P77)

李新宇认为历史事实证明辛亥革命并未失败。成功与失败的标志应该是革命目标实现与否,辛亥革命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就应该是成功的。临时大总统之孙下袁上不应是革命失败的标志。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辛亥革命十年后才正式提出的,后人不应要求前人完成后来才提出的任务。革命带来的并非只是"假共和",民国也并不只是"招牌"。[46]

三、辛亥革命的意义史研究

(一)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一观点。朱相远指出辛亥革命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一次大碰撞,中华民族如一羽浴火凤凰,在碰撞的烈焰中涅槃、升华,终获新生。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迈向现代化的一次飞跃,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重大转折。[4](P111)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孔子与儒学的创立,以及秦始皇与大一统帝制国家形态的创建,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三大瞩目现象。[47] 辛亥革命是国家转型的助推器:推动国家观念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推动国家权力的合法基础从"主权在君"转向"主权在民";推动国家权力的运转方式从"集权专断"转向"分权制衡";推动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从"宗派朋党"转向"社团政党";推动治国理民的游戏规则从"礼法之治"转向"宪法之治"。[48] 沈世培等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解读,认为辛亥革命对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49]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对此后的资本主义化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0]

(二)辛亥革命是民族融合的起点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一段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两岸人民为追求民族尊严、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是属于两岸人民共有的历史。[8](P12) 无论从地缘上、血缘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两岸都是基于中华民族这个基本认同的命运共同体。虽然两岸在 1895 年之后走过了不太一样的民族主义建构之路,但两岸的"大中国"、"大中华",和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从来没有改变过。[51] 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必然会起到传承中国历史与民族精神的作用;与此同时,两岸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也会随之更加密切,这些都对进一步加强两岸的联系,遏制"台独"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52](P160) 当下中国,虽仍未完全统一,但实处目前"一国两制"下的海峡两岸,皆宣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的继承者,是孙中山的传人。其实,从百年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国共两党正是在争夺继承辛亥革命的主导权上,出现左右分歧,直至分裂。可谓当年在

山下，面向左右而背离分手；但今后定将在中国现代化的山顶上，再次相逢握手言和。[4](P113)

（三）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奠基

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促进政治的巨大变革；分化政治权力结构，促进政治的现代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促进政治的制度化；建立责任内阁制，促进政治模式和权力运作方式的规范化；制定系列法律法令，促进政治权威的法理化；赋予国民政治、选举、立党与集会结社权利，促进政治的民主化；扫除恶风陋俗，促进政治文化的世俗化。[53] 从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与传播，民主行为的养成，新的政治关系的建立等各个方面，辛亥革命重构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54](P5－9)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确立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开端。

（四）辛亥革命升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

刘学照认为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延衍两千多年的帝制，摒弃了以朝代代国家的陋习，第一次出现以中华为国号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此重兴”（丘逢甲语）的历程。辛亥革命创立共和民国是 20 世纪新中国运动的巨大胜利，而 20 世纪中期人民中国的建立和 20 世纪后期以来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续。辛亥革命“在亚洲首创共和”的历史功迹自应彪炳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史册。[2](P150) 毛磊指出辛亥革命升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无论从历史或史学理论上看都符合客观事实。五星红旗是在辛亥革命升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过程中的一面旗帜。尽管五星红旗意义非凡，但它却不是第一次升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55] 辛亥革命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政治方向，位于 20 世纪以来民族复兴史上的三大历史“飞跃”之首。[56]

（五）辛亥革命具有世界历史作用

马敏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同亚洲各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深刻地影响着亚洲政治格局的走向，其流风余响至今未绝。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离不开亚洲各国的支援，其中与中国同处东亚、一衣带水的日本又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而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都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和启迪。孙中山当年也深受在日本流行的“大亚洲主义”的影响，有着一种复兴亚洲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政治抱负并不完全局限于中国国内。辛亥革命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而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并且对今天亚洲各国如何和平共处、共建和谐亚洲亦具有极大的启示性。[57] 钱乘旦也提出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剧烈动荡和反抗的地区，东起于东亚，西迄至南美，横越亚、欧、非三洲，直插美洲的中心部位，在有陆地覆盖的地区，恰好在地球上围成一个圈。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圈，它覆盖的是人类所有最古老文明的诞生地，即覆盖的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东正教文明、古埃及文明、印第安文明的核心区，而所有这些文明加起来，几乎就等于整个人类的文明！辛亥革命是在西方列强向全世界所有文明核心区发动全面进攻并几乎要取得成功时，整个世界作出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环节。辛亥革命正是世界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转角点。[58] 步平强调要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辛亥革命之际，东亚的日本和欧洲的英、德、俄、意都还有君主在位，尽管废除帝制并不等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首先推翻帝制，不仅走在亚洲的前列，就是在欧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32](P20－21)

（六）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

在对辛亥意义的褒奖声中，还有另外一些声音，我们不能回避。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而只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30](P75) 金冲及先生也提到，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59](P17)

四、辛亥革命的地方史研究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地方史研究突出表现之一在于各省份与地区今年出版发行了记录不同省份和地区在辛亥革命前、革命中以及革命后图景的图书,体现了各地区与辛亥革命的渊源与承继。例如:杭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的《杭州:辛亥革命百年图志》,以杭州辛亥光复为主线,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浙江和杭州的政治、军事历史,为读者完整地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杭州的社会历史面貌;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了《山西辛亥革命史》一书,收录了孙中山先生在太原六次演讲等重要文献;山西辛亥革命领导人阎锡山、南桂馨、张树帜等人的回忆录和日记以及部分较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展现了山西辛亥革命充分牵制清王朝反动势力,支援武昌革命军的作用;甘肃省档案局馆编辑了《辛亥革命在甘肃》,此书将过去散乱的档案编辑成册,系统、真实、客观、全面地反应了辛亥革命在甘肃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由章开沅先生作序的莫世祥新著《中山革命在香港》,全景式展现了孙中山与香港的历史,由最初的以香港为推动革命的海外基地,到其后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始终以香港作为反袁、护国、护法等历次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托。凸显了香港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成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摇篮与辛亥革命的源头之一的历史意义;武汉市地方办公室编纂的大型史书《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以 100 年的视角鸟瞰辛亥革命,用 100 年的时空记录辛亥革命,在 100 年的大背景中解读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地方史研究突出表现之二在于进一步挖掘了辛亥革命进程中一些特殊区域对于推动革命进程的特殊贡献。黎志刚认为香山地区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在革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香山县与孙中山革命思路的萌芽关系密切;香山革命党员在筹款、革命宣传中的贡献显著;香山妇女和海员在运输军火中还发挥了特殊作用。香山地区是研究辛亥革命不能遗忘的角落。[60] 霍启昌考察了为什么港澳、港澳人能够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成功做出重大贡献,认为港澳虽是殖民地,但却是法治之区,港澳现代化城市建设对革命思想起到了启发作用;港澳经政环境造就了富有及有政治地位的华人,香港教育社会环境与支持策进了革命运动的华人精英,因此港澳及港澳华人对辛亥革命能够最后成功是功不可没的;甚至断言没有港澳华人的支持,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进程无疑将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向。[61] 李谷城也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维度考察了香港与辛亥革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崔世平从维新派在澳门、同盟会在澳门以及革命党人在澳门的活动重点分析了澳门为什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仁人志士的避风港。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地方史研究突出表现之三在于辛亥革命对地方区域发展的持续促进。任金帅以两湖为中心考察了辛亥革命与乡村公产运作的历史变迁,认为以辛亥革命为主导的政治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使乡村权力分配格局不断分化、重构并逐步走向失衡。公产之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亦因这种“历史变动”产生畸变,进而激化乡村内部重重矛盾,促成新的革命运动。[62] 张宏卿认为江西作为较早响应武昌首义和打响反袁第一枪之地,辛亥革命对近代江西的政治转型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初步孕育,民间社会力量有了一定的成长;二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党派、团体活动活跃,形成了从事政治实践与竞争的实体;三是议会政治的尝试,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63] 王飞麟等认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教育实现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作为首义之地的湖北新式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师范教育在辛亥后越发受到重视,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的新式教育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64] 周秋光等提出辛亥革命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对湖南慈善事业的发展影响甚大,整体上推进了慈善事业法制化进程;促使了民办慈善事业的勃兴;推动了教会慈善事业的繁荣。[65] 武汉市委党校课题组更是把辛亥首义与武汉城市精神联系在一起,辛亥首义中所表现出来的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是武汉新时期城市精神的宝贵资源。[66]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地方史研究突出表现之四在于对辛亥革命时期边疆史料和事件的梳理与挖掘。冯建勇以“政治博弈”与“国家构建”为研究主线,阐述了清祚败亡之际,外蒙王公、喇嘛心理之嬗

变，以及此等状况下清末政府及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之应对；探究了当外蒙局势混沌之时，俄国对外蒙边疆之渗透，以及围绕外蒙问题，俄国、中国及外蒙地方三方之博弈，并就 1911 －1915 年间三方政治博弈及“国家建构”情形做了整合性阐述，揭明此期外蒙政治态势。[67] 刘国俊考察了辛亥革命期间在新疆先后爆发的迪化、伊犁和喀什起义，认为这些斗争沉重的打击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为推翻帝制以及“共和”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68] 李勇军论证了清末民初西藏建省情况，指出民国初年的西藏建省论虽仅仅停留在政治口号上，但也表达了民国北京政府收回西藏主权和治权的政治姿态，并最终成为中、英、藏讨价还价的砝码之一。汉、满、蒙、回、藏五族一体是中华民国处理民族边疆问题的重要思想，收回西藏主权是民国历届政府不变的大政方针，这一治边思想或多或少为我们今天发展和完善边疆治理体制，建设中央与边疆的和谐关系，提供了些许裨益。[69]

五、辛亥革命的学科史研究

（一）辛亥革命与教育学

辛亥革命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辛亥革命为界点，辛亥革命前十年（1901—1911）与辛亥革命后十年（1911—1921）的近代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教育改革者由以政治家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家为主；教育宗旨从以“忠君、尊孔”为主转变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主；学制制订由取法日、德转向取法美国并逐渐趋近中国国情。[70] 辛亥革命前后教育行政的演进，学制系统的变化，人才教育观的革新，社会教育设施与实践的发展，使辛亥革命成为我国近代社会教育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之一。[71] 蔡元培更是提出新式教育应注重“五育并举”（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主义）的教育方针，并鲜明地指出，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而世界观和美育主义为超轶政治之教育，特别把德育、世界观和美育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五育并举”全面的教育理念，还要求注重西学、重视女子教育与师范教育等新的教育主张。[72] 辛亥革命还从政治、体制、理念及多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发展发生着复杂的作用，尤其是《大学令》的颁布，确立了大学新的宗旨和体制，更新了大学精神主题与内涵，为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教育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制度环境和精神理念引领。[73]

（二）辛亥革命与政治学

辛亥革命产生了亚洲第一个废除君主世袭制度的国家——中华民国，它促使我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从“人治”到“法治”、从“政治冷漠”到“积极参与”、从“集权专制”到“分权制衡”的变迁。虽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但其历史贡献在于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74] 李育民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的意义，如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是检视中外关系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背景；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和方针以及与内政变革的关系，不仅是中外关系史的基本问题，且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众反侵略斗争也在辛亥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辛亥时期的外交遗产对民国的影响等等，亦有深入剖析的必要。[75] 辛亥革命还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变革，剪辫运动是从身体到灵魂的革命，放足运动解除了中国女性的切肤之痛，民国新装瓦解了封建王朝衣冠体制，废跪拜礼告别了森严的等级制度。[76] 辛亥革命使人性获得极大的解放，关注人的权利和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思想界的一大趋势，慈善思想在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也掀起了第二波发展高潮，出现了慈善福利论，政府责任论，工商养民论，这一切都直接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77]

（三）辛亥革命与新闻学

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舆论和办报活动，他称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各地革命党人，通过创办报刊、出版图书，传播西学、新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谭嗣同的《仁学》（1897），梁启超的《新民论》（1902 －1906），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革命军》（1903）、《猛回头》（1903）、《狮子吼》（1905）等刊物的发行，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营养，准备

了思想酝酿,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和舆论引导。[78](P1) 正如孙中山在他的《自传》中所说"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随着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出版法令的制定和颁布,辛亥时期的书刊报呈现内容丰富,政治鲜明等特点,在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促进思想启蒙,鼓舞广大有志之士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79] 民国时期,在出版业方面,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当时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国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这是当时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为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80](P77) 辛亥革命前后书报刊的出版和发行,促进了近代新闻学的发生和发展。

(四)辛亥革命与法学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一百余年的历史上,辛亥革命有着特殊的意义。辛亥革命带来的法律变革具有原创性,它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告了封建政治法律制度的崩溃,并以实现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向现代民主主义法律制度的历史转变为理想,引发了 20 世纪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揭开了中国法制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80] 辛亥革命也促成了中国社会司法观念从传统性到西方化,再从革命性到专业化的变迁。[81] 尽管民国以来并没有改变清末形成的对传统法律思想承继和外来法律移植并重的局面,但显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商事立法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党政主导推进的环境下,社会本位视野下,私法从书斋走向社会实践。[82]

(五)辛亥革命与文学

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典文学正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迈开了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步伐。从倡导现代民主政体到"新民"、"觉民",再到抬高小说地位的一系列行为,都显示出晚清文学运动与辛亥革命相互激荡,相互映衬的特点。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转折意义值得重视。[83]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其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并不单纯是个人精神创造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宏观的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辛亥革命正是这一国家新体制建立过程的开始。[84] 朱相远认为辛亥革命说到底,实为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一次大碰撞,中华民族的第四次文化复兴即肇始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文学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投影,从创作主体来看,有现代文学前驱者,更有辛亥革命的亲身参与者,也有不忘历史的后来人;从内容来看,有革命豪情的抒发与对烈士的礼赞,有革命历程的写实与对革命的肯定,也有对革命必然性与复杂性的揭示,还有对其不彻底性的批评;从文体来看,有诗词、联语、歌曲和通俗小说,也有杂文、随笔、小说、剧本和评论,还有各种历史叙述的文本;从风格来看,有激昂或悲愤的抒情,也有冷峻而真切的写实,还有鞭辟入里的分析。辛亥革命为文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85]

(六)辛亥革命与女性学

辛亥革命也是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转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女性批判封建家族制度,抨击封建婚姻制度,摆脱经济附庸地位,开始了以反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追求人格独立为主线的嬗变。[86] 由于辛亥革命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为女权思想的觉醒提供了阵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十余年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催化下,女性积极自主地追求独立平等和自身的社会价值,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女子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87] 发端于近代的中国女子教育在辛亥革命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女子教育的规模得到拓展,这极大地解放了中国妇女的思想,唤醒了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中国女性在这场巨变中所发生的与自我、与他人(主要是男女关系)以及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后来中国女性高扬主体意识,真正走向精神解放做了可贵的探索。[88]

六、辛亥革命的文献史研究

(一)全景式、编年体的文献成果

搜罗已推出的辛亥百年出版物,举其大端,有中华书局历时 40 年整套 36 册的《中华民国史》,有人

民出版社的《孙中山传》,中华书局的《孙中山全集》(全 11 册),广东人民社的《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社的《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岳麓书社的《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风雨欲来——重绘辛亥革命历史地图》,世界图书公司的《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辛亥革命实绩汇编丛书》,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国士》(4 册),等等。[78](P1) 这些成果系统再现和阐释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二)人物志的文献成果

主要是整理出版了一批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文集、传记和回忆录。如人民出版社的《孙中山传》、团结出版社的《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等。此外,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全 11 册),收录孙中山先生的论著 8000 余篇,500 多万字,是目前较为完备的孙中山著作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安排出版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的文集,如《田桐集》、《张难先集》和《吴禄贞集》等,这些文集和传记勾勒了辛亥革命的群体肖像,极大拓展了对辛亥革命人物研究的范围,对更好的解读辛亥历史提供了一个视角。

(三)地方志的文献成果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的《杭州:辛亥革命百年图志》;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山西辛亥革命史》;甘肃省档案局馆编辑的《辛亥革命在甘肃》;莫世祥新著《中山革命在香港》,武汉市地方办公室编纂的大型史书《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等,体现了各省份和地区与辛亥革命的渊源与承继,开掘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蕴和多元价值。

(四)学术研究的文献成果

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乏首度公开面世的珍贵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凤凰出版社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九州出版社的《辛亥革命历史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辛亥革命在上海——新史料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辛亥革命历史珍档》[89]、新华出版社的《北京档案史料》2011 年第 3 辑《辛亥革命后的北京》、九州出版社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等。这些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使辛亥革命的研究有了新的增长点,展现了一种新气象、新思路。

七、辛亥革命的中共党史研究

(一)辛亥革命与中共领导人研究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 10 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者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59](P17)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后,正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受到鼓舞,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贴在校门口墙壁上,是其“第一次发表政见”,随后投笔从戎,加入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90] 毛泽东高度重视研究辛亥革命史,在 1924—1976 期间,毛泽东反复地系统地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经验教训,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十四个方面,这宗研究历史指导实践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91] 梁堂华研究了徐特立在辛亥革命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指出其政治思想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一步步发生变化,由早期自发的民主思想与意识到支持民主改良,到后来转向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徐特立积极动员湖南教育界人士响应起义,起义成功后担任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一心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但由于革命极不彻底,官场仍然充满腐败,他愤而辞职去寻找新的道路。作为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徐特立在伟大的辛亥革命中写下了自己的一笔。[92] 柯新凡研究了董必武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与转变经历了辛亥革命前民主主义思想的孕育与启蒙,到辛亥革命中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再到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93] 刘伯承也是在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

大地之际,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

(二)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最具权威性的诠释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据笔者目力所及,在今年纪念辛亥百年发表的著述中,在涉及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是具有承继和发展关系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金冲及先生的这段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两个日子如此相近,中间只隔了不到10年。这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发展过程:既有阶段性,又有延续性……辛亥革命在这个探索前进的过程中起了某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对旧中国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也帮助许多中国先进分子在思想上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随后的严重挫折,又使他们看到不能再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继续向前探索,终于找到了新的、正确的道路。路只能一步一步地走。有如上山,只有先跨上前一个较低的台阶,才能再登上新的、更高的台阶。"[94]这段话是对辛亥革命与中共党史承继关系的最生动的诠释。王心富认为: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思想条件和干部准备,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共产党确立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要的借鉴。辛亥革命无论从成功的一面,还是失败的一面,都埋下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种子。[95]张海鹏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理想和事业,而且大大发展了他们的理想和事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忠实继承者。[96]师泽生等认为辛亥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预演和必要过渡阶段。[54](P5)张晋藩则更简短的概括为"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97]还有学者从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角度,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的维度来论述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承继关系。

八、辛亥革命的海外研究

崔华杰认为海外英文研究者群体包括英美本土研究者,也有澳洲、加拿大、日本等国学者,也包括旅居海外的华裔研究者以及曾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现当代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因其所处的不同的政治环境、史学理论与思想以及研究路向,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辛亥革命爆发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比较重视政治史与外交史研究领域;第二阶段为20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后期,史料文献整理、人物研究有新突破;第三阶段为20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区域史研究成为新热点;第四阶段为20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此期研究在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专门性著述并出现区域化的研究特点,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进入新千年后的成果却稍显薄弱。[98]这为国内学者了解辛亥革命海外英文研究提供了资料。

2011年10月在武昌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俄罗斯学者H.索特尼科娃梳理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从20世纪至21世纪初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方向、以及找到中国对辛亥革命看法的特征极其缓慢变化的历程,为我们了解俄罗斯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与总结。H.Π玛玛耶娃则研究了辛亥革命与宪政思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问题与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辛亥革命提出了与传统有着本质区别的政治构架和国家管理模式。革命后的南京革命政府的各项举措,尤其是孙中山的宪法观以及"三阶段"、"五权计划"为中国开始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运动进程铺就了"一条通道"。韩国学者裴京汉以韩人志士金奎兴于辛亥革命前后在广东地区参与的革命活动为中心,论述了韩人初期对待共和革命的反应和参与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况,以及以金奎兴为首的当时流亡中国的韩人志士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评价,进而论述辛亥革命与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关联。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则根据梁启超访美期间的采访记录,以西方社会主义者的视角考察了晚晴中国社会主义。法国学者巴斯蒂研究了普世价值观对辛亥革命精神的引发作用,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年中,自由、民主观念,以及相对较少的程度的人权观念,就已经成为鼓动青年和知识分子革命精神的主要灵感,他们并没有把这

些观念当做西方文明的观念,而是当作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被随后民族主义力量的无上权威降为次要理想,20 世纪全部中国政治史贯穿了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冲突。学者 Peter Zarrow 从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叙述发掘史料,探求辛亥革命情结下的革命叙述对革命的进程以及结果的影响。学者 Don C. Price 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并着重考察了宋教仁政治思想的演变。[99]

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日本是一个重要的通道,对辛亥的认知也不例外。2011 年 11 月在日本横滨召开了由日本神奈川大学与清华大学和中国史学会主办的"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很多日本学者对于辛亥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庆应义塾大学的伊藤一彦从辛亥革命前后的边境丧失进行考证,得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种族革命而已。北九州市立大学金凤珍分析了辛亥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得出二者共同走向民主共和之路的共同性结论。神奈川大学的大里浩秋以宗方小太郎本人留下的日记和报告为基础,追溯他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的足迹,通过小太郎在辛亥革命以前进行的活动,专门研究分析了辛亥革命与宗方小太郎,探明其与中国关系,思考其具有的意义。北海道大学的佐藤守男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研究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与辛亥革命,论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所采取的基本对清方针,即二分中国构想,促成中国的南北对立状态。千叶大学的见城悌治研究了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介绍了留学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动向以及该校的行动,考证了该校毕业生回国后在中华民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展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面。山梨大学的松本武彦以山梨县为研究对象,从辛亥革命的中国体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企业家的动向,县民对革命的理解四个方面考察了 1911 – 1916 日本地方社会的中国问题理解,认为辛亥革命对日本地方社会的影响及所及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度。大妻女子大学的石川照子从女性史和性别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关于辛亥革命后宋庆龄与日本的种种关系,并提出应进一步发掘宋庆龄与有关中日女性关系史研究的命题。滕谷浩月认为新军士兵与会党成员都是辛亥革命起义军的核心力量,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辛亥革命研究里,几乎没有考察新军于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的著述,为此他以爱国团的建立为中心,考察了新军将校和士兵为什么参加革命军,如何掌握中华民国的政治。电气通信大学的藤井升三以"满洲"的租借问题为中心,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文与日本。认为辛亥革命因其树立了共和制,可以与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 20 世纪的俄国革命并立,孙文在 30 年的革命活动中日本是其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对日态度经历了最初的依存到其后的批判。久保田文次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认为辛亥革命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觉提出以实现真正现代化为纲领、即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辛亥革命史后续革命的起点。[100] 日本学者的研究领域不仅涉及辛亥的性质、意义,还关乎具体层面以及辛亥与日本的微观领域的现象研究和史料考证,为我们以后继续辛亥革命的研究拓展了思路、开阔了视野。

九、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一) 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缺乏长程式与总体史的眼光

回望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书刊、影像、报道,可谓成果丰硕,所涉领域较之以前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上文的综述中也可看到,研究成果的领域分布不均衡,水平也参差不齐。章开沅先生指出对于辛亥革命百年的反思,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思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历史,一是反思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历史是一个整体,所以应该将辛亥革命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除了回望辛亥之前一百年,辛亥以来一百年,下一个一百年也要纳入视野。[101] 应该了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了解辛亥革命是怎么来的,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是怎么来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百年发展变迁。第三个一百年是探讨从现在开始往后一百年中国的发展走向,实现人性的回归,解决辛亥革命以来仍然存在的一些普世性世界难题,使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国和强国。[52](P161)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功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9](P22) 我们甚至应将辛亥革命放到历史时空联系的脉络之中,不是作为断代之断代史,而是将整个辛亥时期放到近代中国、东亚乃

至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去,放到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长河以及不作分门别类细分化的本来状态中去,进行贯通式考察,用整体的眼光探究革命乃至整个辛亥时期的历史。[102] 由此看见,辛亥研究还需要大力发展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发展广泛的比较研究。若没有这种深度的反思和总体史的眼光,辛亥革命也仅仅是一种纪念;这一百年带给我们的也只能是一种符号,苍白、简单而又乏味!

(二)辛亥百年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有待进一步拓展

辛亥革命的研究应以史论史,论从史出,言之有物,尽量撇开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傅国涌指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30](P74-75) 欧阳军喜也认为孙中山撰文建构了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条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了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了一种革命后革命党人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叙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103] 研究辛亥革命,历史学家有责任对一些民众认识仍比较模糊的问题,从学理与史实等方面给予解答,去还原真实的历史。史学家们所提出的观点要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不能为了奇而奇,要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

人物论析一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域之一,但是辛亥的研究重心不能都只放在那些过场的大角色们,也应该关注推动这场震惊世界革命的幕后者。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应该把目光投向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傅国涌提出"群角"概念,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也是辛亥百年变局留给我们今人的一点教训。[30](P78)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 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11,(20).
[2] 刘学照. 辛亥革命研究略议[J]. 社会科学,2011,(2).
[3] 李恭忠. 孙中山:英雄形象的百年流变[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4] 朱相远. 辛亥百年祭[J]. 史学集刊,2011,(4).
[5] 鲍家树. 第三只眼睛看辛亥——张鸣教授访谈录[J]. 探索与争鸣,2011,(6).
[6] 李维民.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人物述评[N]. 北京日报,2011-10-10(第 023 版).
[7] 章开沅. 辛亥百年遐思[J]. 近代史研究,2011,(4).
[8] 周铁农. 百年辛亥不朽中山[J]. 决策与信息,2010,(10).
[9] 章开沅. 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J]. 决策与信息,2011,(2).
[10] 李 琨. 百年辛亥: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梳理[J]. 南昌高专学报,2011,(2).
[11] 马先睿.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2).
[12] 赵书刚.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两岸关系,2011,(10).
[13] 邱格屏.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海外洪门的动员[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4).
[14] 沈斐斐.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海外华侨统战工作[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2).
[15] 萧致治. 黄兴与日本[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3).
[16] 刘家鸣. 鲁迅回顾和评议辛亥革命[J]. 作品与思想研究,2011,(9).
[17] 丁 辉. 鲁迅与辛亥革命[J]. 民主与科学,2011,(4).
[18] 袁南生. 蒋翊武对辛亥革命的创造性贡献——兼与孙中山早期革命策略相比较[J]. 社会科学辑刊,2011,(4).
[19] 刘云波. 论宋教仁对辛亥革命的理论贡献[J]. 湖南社会科学,2011,(3).
[20] 刘芳,甄红卫. 宋教仁政治思想研究综述[J]. 学理论,2011,(14)
[21] 黄健敏. 孙眉与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22] 张金超. 田桐与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23] 周新国,丁慧超,秦毓鎏与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24] 庞卫东. 近三十年来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侨问题研究综述[J]. 八桂侨刊 2011,(1).
[25] 徐炳三. 辛亥纪念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加强——基于《叻报》为中心的考察[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26] 张　静,王俊桥,解庆宾. 从辛亥革命看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27] 彭平一,邱添韵. 长沙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辛亥革命[J]. 长沙大学学报,2011,(1).
[28] 沈荣国. 珠海留学人与辛亥革命[J]. 岭南文史,2011,(2).
[29] 陈昌福.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4).
[30] 傅国涌. 辛亥革命百年变局[J]. 名作欣赏,2011,(25).
[31] 吴鸿丽. 近代闽南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5).
[32] 步　平. 在时空背景下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J]. 近代史研究,2011,(4).
[33] 宋惠昌.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34] 吕绍勋. 辛亥革命中的基督徒人士[J]. 学理论,2011,(5).
[35] 王　静. 传教士笔下的辛亥革命——以布朗的“中国革命”为中心[J]. 中国图书论,2011,(9).
[36] 谢　放. 多维视野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37] 陈德辉. 辛亥革命必然发生的历史轨迹[J]. 江淮文史,2011,(4).
[38] 杨银权. 试论科举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关系[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39] 沈渭滨. 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应尊重历史事实[J]. 探索与争鸣,2011,(8).
[40] 黄克武. 辛亥革命是怎么成功的?[N]. 南方周末,2011-10-6(第 B11 版)
[41] 姜义华. 中华天下国家责任伦理与辛亥革命[J]. 社会科学,2011,(9).
[42] 李吉奎. 辛亥革命成功了还是失败了?[J]. 同舟共进,2011,(9).
[43] 马　勇. 1911:中国大变局[J]. 中国报道,2011,(10).
[44] 许增紘. 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45] 张　皓. 革命阵营内的名位之争与辛亥革命的失败[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46] 李新宇. 辛亥革命“失败”辨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7] 李恭忠. 辛亥革命与中华文明的伟大转型[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4).
[48] 颜德如. 国家转型的助推器: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辛亥革命[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4)
[49] 沈世培,肖宗建. 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50] 曹明臣.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现代化视角下的辛亥革命[J]. 文史博览(理论),2011,(2).
[51] 辛　旗. 穿越百年历史强化民族认同共创民族复兴—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两岸关系思考[J]. 两岸关系,2011,(5).
[52] 朱　英.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与百年超越[J]. 社会科学,2011,(2).
[53] 岳世平.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贡献[J].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1,(2).
[54] 师泽生,林毅. 辛亥革命的价值与启示[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55] 毛　磊. 论辛亥革命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作用[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4).
[56] 刘庆楚. 民族复兴史上的三大历史“飞跃”[J]. 南京社会科学,2011,(7).
[57] 马　敏. 辛亥革命与亚洲视角[N]. 光明日报,2011-11-14(第 011 版)
[58] 钱乘旦. 论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定位[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5).
[59] 金冲及.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J]. 决策与信息,2011,(10).
[60] 黎志刚. 香山和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61] 霍启昌. 为什么港澳、港澳人能够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成功作出重大贡.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62] 任金帅. 辛亥革命与乡村公产运作的历史变迁——以两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J]. 人文杂志,2011,(5).
[63] 张宏卿. 试论辛亥革命与近代江西政治转型[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2).
[64] 王飞麟,盛　雷. 辛亥革命与湖北教育的转型[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65] 周秋光,张少利. 论辛亥革命对湖南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
[66] 武汉市委党校课题组. 辛亥首义与武汉城市精神[J]. 学术园地,2011,(5).
[67] 冯建勇. “政治博弈”与“国家建构”: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问题.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68] 刘国俊. 新疆辛亥革命述论.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69] 李勇军. 清末民初的西藏建省论.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70] 陆玉芹. 辛亥革命前后十年的近代教育[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71] 曲铁华,慈玲玲. 辛亥革命前后社会教育发展比较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9).
[72] 向德富,向会斌. 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变革及其现代启示[J].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2).
[73] 储朝晖.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发展[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9).
[74] 郑炳凯.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6).
[75] 李育民. 加强辛亥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76] 朱俊丰,李楠楠. 辛亥移风易俗大变革[J]. 决策与信息,2011,(10).
[77] 蔡勤禹. 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78] 李人凡. 辛亥革命研究及出版的新思考[J]. 出版参考,2011,(30).
[79] 周慧芳. 辛亥革命时期书刊报的出版和利用[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80] 梁迎修. 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历史演变及其实践逻辑[J]. 河北法学,2011,(9).
[81] 牛 杰.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司法裁判观念的变迁[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82] 朱世文. 辛亥革命与中国私法发展[J]. 新疆社会科学,2011,(3).
[83] 栾梅健.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J]. 南京社会科学,2011,(9).
[84] 李 怡.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85] 秦 弓. 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86] 李桂梅,黄爱英.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女性伦理的嬗变[J]. 伦理学研究,2011,(5).
[87] 叶泽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的发展[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5).
[88] 王凌皓,朱志峰. 辛亥革命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嬗变及历史影响[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9).
[89] 吴尚之. 为中华民族留下永恒记忆——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出版工作概述[J]. 中国出版,2011,(19).
[90] 夏 航. 毛泽东在党的初创时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上)[J]. 党史文汇,2011,(1).
[91] 李跃乾,周新国. 论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5).
[92] 梁堂华. 徐特立与辛亥革命[J]. 长沙大学学报,2011,(4).
[93] 柯新凡. 自觉与坚持:辛亥革命前后董必武民主主义思想形成与转变的历史考察[J]. 学术论坛,2011,(8).
[94] 金冲及. 一百年前和九十年前[J]. 近代史研究,2011,(4).
[95] 王心富. 略论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6).
[96] 张海鹏. 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J]. 中国报道,2011,(10).
[97] 张晋藩.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几点感悟[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4).
[98] 崔华杰,辛亥革命海外英文研究一百年[J]. 东岳论丛,2011,(9).
[99] 各国学者.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未刊发). 中国武昌 2011.
[100] 日本学者. 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未刊发). 日本横滨 2011.
[101] 章开沅. 反思与纪念:辛亥要谈三个一百年[J]. 同舟共济,2011,(10).
[102] 桑 兵. 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103] 欧阳军喜. 记忆与历史: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及其影响[J]. 人文杂志,2011,(5).

(责任编辑:吴 赘)